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SHANGAN NING BIANQU XIANGCUN  
MINZHU ZHENGZHIGUANSHI YANJIU

# 陕甘宁边区乡村 民主政治建设研究

杨梦丹/著

 人 民 出 版 社

SHANGANNING BIANQU XIANGCUN  
MINZHU ZHENGZHILIANSHI YANJIU

# 陕甘宁边区乡村 民主政治建设研究

杨梦丹/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继平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周方亚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杨梦丹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01-015363-6

I. ①陕… II. ①杨… III. ①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研究 IV. ①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0127 号

##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研究

SHANGANNING BIANQU XIANGCUN MINZHU ZHENGZHI JIANSHE YANJIU

杨梦丹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75

字数:358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5363-6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后 记

2008年,我有幸申报成功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同年,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于我,开始历经十月怀胎孕育生命的神奇过程,于次年4月25日生下爱子。为人之母后,既要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还要完成种种科研任务,从而使得本课题的研究迁延这么多时日,直到2014年完成了作为本课题最终成果的该书,并以“良好”等级结项。

本书出版之际,衷心感谢高尚斌恩师多年来对我的指导和关爱。高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教导,还在生活上给我以关怀,在工作上给我以指点。如果说自己近年来在研究上略有小成的话,其渊源在此。

本书的撰写、修改和出版,得到了许多师友的无私帮助。李忠全老师将自己收藏的陕甘宁边区方面的文献资料借赠于我,还对本课题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使我受益匪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我查阅资料提供了种种便利。同时,非常感谢人民出版社编辑吴继平先生在出版过程中给予我无私热情的帮助。

多年来,感谢我的爱人刘军始终给予理解和支持,使我能安心自己的科研工作。这本拙著,献给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们。

杨梦丹

2015年9月21日于西安

#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	001
<b>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乡村党组织建设 .....</b>	<b>016</b>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党组织的基本状况 .....	017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党支部建设 .....	033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党群关系与群众路线 .....	077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党政关系 .....	094
<b>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选举 .....</b>	<b>109</b>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 1937 年乡村选举 .....	109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 1941 年乡村选举 .....	127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 1945 年乡村选举 .....	149
<b>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乡村自治建设 .....</b>	<b>174</b>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自治模式 .....	175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自治的基础:模范乡村建设 .....	189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自治的具体实践分析——以绥德县 吉镇区王家坪村为典型案例 .....	214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自治的历史经验 .....	223
<b>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运动 .....</b>	<b>228</b>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 .....	229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运动 .....	259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培育“新型公民”的民主改造运动 .....	281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解放运动 .....	303
<b>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法制建设 .....</b>	<b>330</b>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 .....	330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人权制度建设 .....	350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土地立法及实施 .....	378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婚姻家庭法制建设 .....	385
第五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司法建设 .....	404
<b>主要参考文献 .....</b>	<b>421</b>
<b>后 记 .....</b>	<b>423</b>

# 导 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乡村实行的民主政治建设,使党在乡村社会实现了较高的控制程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群众根基,创造了延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典范”的辉煌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飞速发展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关键时期。总结这一时期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乡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的宝贵政治遗产,是我们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陕甘宁边区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各方面的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相比之下,与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直接相关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大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政权建设,而对政权建设以外的民主政治建设考察者少;对边区一级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较多,自县以下的分量渐轻,乡村情况最为薄弱。这既不利于全面系统地梳理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部面貌,也不利于总结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有鉴于此,本书试图以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为研究对象,慎重依赖丰富而可靠史料,尽最大努力走进历史的“现场”,以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建设运作层面为关注重点,揭示共产党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期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 一、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党史学界对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有关问

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与许多学界前辈在陕甘宁边区的资料整理出版方面作出的很大贡献有着极大的关系。目前整理与出版的与该课题相关的资料(包括内部资料)主要有: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1—1986年陆续出版)是一部大型综合性的资料,共14辑,主要收录了从1937年9月至1950年1月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形成的重要文电,所选的材料大部分来源于省档案馆馆藏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为研究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等方面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史料。1989年至1994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组织编辑的一部边区党的系统大型资料,包括《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至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至1945年),该资料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党务之外,还涉及边区的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其中绝大多数是从未公开的原件刊印,还有许多当时西北局的调查研究资料,对研究边区政治、经济十分珍贵。这两部大型综合资料是研究本课题主要原始资料来源。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主编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陆续出版)也是一部综合性资料,该书资料主要源于《解放日报》、《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陕甘宁边区重要政策法规汇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条例》等,该资料为研究本课题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边区档案、报刊资料、个人回忆和日记的整理与出版,直接推动了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共出版专门研究边区学术专著5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涉及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政治类的主要有:宋金寿、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胡民新等编著的《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杨永华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永华、方克勤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



(诉讼狱政篇)(法律出版社,1987年),肖周录的《延安时期边区人权保障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组编的《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1982年),李智勇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梁星亮、杨洪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曾鹿平主编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建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朱鸿召的《延安曾经是天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张炜达的《历史与现实的选择——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王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

概括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边区民主政治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一)民主建政是抗战时期边区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因此受到学者的关注。陈先初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是研究民主建政的重要论文,文章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对民主问题给予了极大重视,尤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全面推行民选制度,在政权组织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建立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帮忙政府”,将民主政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民主选举是边区民主建政的主要内容,宋金寿、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中对边区三次选举的历史过程、特点、意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论述。王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第三章通过深描和客观分析,论述了抗日民主政权时期的选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选举制度与政治生态环境、选举制度与党的领导、选举制度与政权建设、选举制度与人民的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从理论上总结了民主选举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边区政权的性质、构成和特点的研究。关于边区政权的性质,

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边区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谈不上“一国两制”,国民党在边区所有实际问题上都无权插手,没有发言权。边区政府是苏维埃政府的继续和深入,是新中国的雏形。宋金寿、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对边区政权建设做了全面研究。关于边区政权的构成,他们指出边区政权是由参议会、政府、法院三部分组成,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边区政府是边区最高行政机关;法院是边区的司法机关。边区的政权结构模式,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也不同于国民政府的“五权宪法”,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时人称之为“两权半”,即立法、行政的独立和司法的“半独立”。熊宇良对边区政权的形成、选举制度、施政纲领、参议会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李智勇对边区政权形态特点做了研究。

(三)“三三制”是边区政权组织的主要形式,是边区政治民主化的标志。王永祥文章论述了“三三制”提出的原因、意义,宋金寿论述了“三三制”提出的历史过程,陈昌保论述了边区政权的特色,认为在“三三制”政权中,“实行共产党统一的一元化领导制度不变”。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中共民主制度的尝试,勒铭、曾鹿平比较全面论述了边区参议会制度创立的历史背景,三届参议会的历史进程,参议会与抗日民主政权,参议会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参议会的立法,参议会与“三三制”政权,参议会与“精兵简政”等问题,以及边区参议会的历史意义。

(四)法制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边区作为抗日模范根据地,在法制建设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杨永华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是一部全面反映边区法制建设的重要著作。韩松、肖周录从社会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等方面对1945年边区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破产处理办法》做了研究,杨永华论述了边区人权法律产生的背景、人权的法律概念、总结了边区保障人权的历史经验。张炜达的《历史与现实的选择——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研究》从边区宪政法制及创新、边区刑事法制及创新、边区土地立法及创新、边区诉讼法制及创新、婚姻家

庭立法及创新,以及边区法制创新的现实启示角度对边区法制创新的总体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对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制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从一些专题研究论文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徐增满认为边区的法制主旨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的精神,依靠群众的法制路线,保障民主的法制原则,依据政策的法制方针,求实创新的法制作风,反帝反封建的法制内容。

(五)边区乡村的民主建设研究。梁星亮、杨洪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边区法制建设、边区社会建设,边区模范村建设和医疗建设、边区乡村文化建设运用大量的原始资料,以全新的视角深化了边区史的研究。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对边区经济社会史展开了研究,涉及边区农村经济,边区的乡村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变迁、妇女问题、社会教育、社会风气等,为研究边区民主政治提供了宏观视角。李里峰的《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以各级党内文件为基本资料,侧重探讨与党组织相关的各种实践问题,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形象地展示出来,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共产党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研究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研究的总体情况看,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并且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价值的观点,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宏观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但是,从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看,第一,这些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政权建设,并非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政权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不等同于民主政治建设,后者应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第二,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重点是边区一级,自县以下的分量渐轻,乡村情况最为薄弱,既不利于全面系统地梳理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部面貌,也不利于总结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启示。第三,比较深入系统地研究本课题的专著或系列

成果还未见到,因此,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仍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其学术价值在于,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是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越下层越要民主,下面的基础打得广大而且结实,民主政治的力量和成绩才能出人测度地发展起来。”“草根民主”是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系统研究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既是历史研究的需要,也是填补学术界尚无问津这一课题的需要。其应用价值在于,系统研究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系统总结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二、研究内容及其观点

本书以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为研究对象,以边区乡村党组织建设、乡村民主选举、乡村自治建设、乡村民主运动、乡村民主法治建设为线索谋篇布局,揭示它们对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总结边区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对现实的启示。

从边区乡村党组织的建设视角来看:

第一,乡村党组织发展与建设的复杂历史过程。陕甘宁边区乡村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大发展,在此期间,为了适应恶劣革命环境达到迅速扩张势力的目的,导致了中共在发展新党员实际操作中无法达到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要求的高标准、严要求,迫使中共面对广大农民的一些固有特性降低要求、简化程序,甚至采用拉夫手段来发展党员,其结果是,在党员数量迅速扩大的同时,党员的整体素质和革命意识却并不理想,尤其是随着革命形势由紧张转变为相对和平的时势下这一矛盾更为突出,即由于党组织参加者大多并不具备坚定的革命信仰,而是盲目加入或者出于生存需要而投身革命行列,当形势处于和平时期,他们的现实

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就出现了党组织生活松散,党员对待工作疲沓的现象,体现出中共在发展党员时无法回避的革命理想与现实需要的矛盾。为了在坚持革命理想与满足现实需要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问题,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采用现实策略与变通之道,不断与农民的素质低下、目光短浅、关注现实利益、缺乏革命理想作斗争,对大多数农民进行发动、教育和改造,同时重新吸纳符合新标准的党员增加党组织的新鲜血液,对不合格的党员通过审查登记,执行纪律、组织整顿与清洗逐出党外。正是通过对乡村党组织改造、相互适应,中共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逐步发展壮大并最终赢得胜利。

第二,乡村党群关系的复杂状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实践中,实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领导方法,形成了党密切联系群众最好的时期,被人们誉为“血肉关系”和“鱼水关系”,正是由于同人民群众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党能从人民群众当中汲取无限的力量,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已是学界的共识。然而党群亲密关系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在复杂的历史动态中形成的。本课题从负担动员、春耕运动、互助合作运动中考察了乡村党群关系演变的历史发展复杂过程。一是负担动员中党群关系矛盾的暴露。在负担动员中,乡村党员既是动员活动的组织者又是动员对象,既要完成上级的任务,又要照顾自己和农民的利益,如果工作做不好,必然会引起党群关系的紧张。通过党内文件的考察反映出动员中确实存在着种种问题,如动员任务繁重,导致农民怨声载道,党员模范作用的错误倾向导致了党员不愿工作,包办命令的作风和存在的包庇,耍私情、贪污腐化、滥行动员的“党霸”现象,通过负担动员一一暴露出来,虽然党采取种种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密切党群关系。二是春耕运动中党群关系的改善。1941年边区进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党群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同时也为密切党群关系提供了契机,即为了战胜困难,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乡村支部工作的重心也由原来的动员为主,变为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以农民的生活富裕为目的。而春耕运动作为生产运动的中心内容,基层党组织在春耕生产中通过走群众路线逐渐地改善了党群关系。三是劳动互助运动中党群关系的深入。党将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是为了实现富裕的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存在农民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农村党员干部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使得互助运动形式主义严重。为解决互助运动中存在的问题,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结合整风运动,在农村党组织中开展反官僚主义作风的教育,在群众路线教育下,支部党员克服了干部生产与群众脱离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能够带领农民组建互助组进行生产的党员劳动英雄与群众共同劳动,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培养了群众观念,至此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逐渐形成。考察和探究陕甘宁边区乡村党群关系的历史演变,为我们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做好新时期党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但要在党的上层组织实践,更重要的是在党的基层下功夫,若党的基层丢掉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会存在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二是群众路线教育是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一剂良药,在工作中是否贯彻群众路线是衡量党是否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标准,离开了这一标准,必然会导致党脱离群众。三是“一切的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人民在发展的成果中,检验党实践群众路线的成效,否则,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必然是形式的,密切党群关系的任务是难以实现的。

第三,乡村党政关系的顺畅与否是基层党组织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抗战时期,党对实行民主政权制度的基本理念是,党以制度和政策的设计,通过非党的群众将自己的主张转化为政府行为,达到领导的目的。然而在革命战争环境中的这一设计理念是不可能在实践中有效实施的,尤其是在乡村中,这一理念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抗战之初,从党内文献可以看出,在基层政权中,党政关系并不理想,最普遍的情形是动员工作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其结果是党的基层支部领导不力。

“三三制”原则提出之后,乡村党政关系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由于“三三制”主要是针对中上层政权的,乡村“可以酌量变通”,因此“三三制”在乡一级基本符合党的设想,村一级基本不实行“三三制”,而强调阶级成分和政治标准,以确保政权掌握在成分纯洁、维护群众利益的党员或进步分子手中。以白塬乡为案例来看,乡村的村政关系极其复杂,既有民主村,也有形式村,还有封建村,经过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后,村政状况总体良好,党对基层政权的领导占据了比较牢固的支配地位。其次,乡参议会的地位、作用的变化,是反映乡村党政关系的一个重要参数。在“三三制”精神要求下,边区取消了抗战初期政府与参议会之间“议”“行”并列,而实行“议行合一制”。这是乡村党政关系从体制上的重新调整。从实际的地位及作用来看,乡参议会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党才是最高和最后的仲裁者。“一元化”领导体制提出后,“三三制”的价值极其有限,有些地方已名存实亡,乡村党政关系的矛盾通过基层干部的不良作风表现出来。经过整风运动的思想教育,组织上的整顿等措施消除了基层干部的不良行为,党的作风得到了改善。

从边区乡村选举视角来看:

从1937年5月到1946年3月,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选举运动。这三次选举运动,一次比一次进步,一次比一次成功,堪称中国历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然而陕甘宁边区乡村三次民主选举的历史背景和作用复杂的,必须客观地尊重历史并予以考察,以期对当今的乡村民主选举提供有益的借鉴。通过对边区乡村第一次选举(1937年)宏观背景的探究,表明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选举的动因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有动员民众、取得抗战胜利的需要,有建立模范抗日民主政权、取得合法地位的需要,有壮大共产党力量的需要。在实践中,为在全国人民面前举起民主旗帜,党在陕甘宁边区乡村进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选举运动。面对边区农民对民主的冷漠和陌生,边区政府经过努力的宣传和有力的组织,使边区的乡村政治秩序发生了重大

变化,使农民第一次体味到民主的“兴味”。然而由于边区是第一次选举,在阶级取向的倾向下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这次选举存在种种缺陷,尤其是在“左”的倾向下,将抗日民主政权变为半苏维埃性质的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

边区的第二次选举(1941年)与第一次选举相比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实行了“三三制”选举。其历史原因也是多样的,既有克服军事政治危机、团结人民共同抗日宏观背景原因,也有战胜经济困难、建立完备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内部原因。由于“三三制”是创举,又关系各阶级的利益,中共经过制定政策、组织保证、有效宣传,使结果基本符合党的设想,从而调节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团结了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稳定了党的执政基础。

边区的第三次选举(1945年)与第一次第二次选举相比较,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自由选举、选举好人”。原因也是复杂的,既有在抗战即将胜利之时与国民党争夺前途命运斗争的宏观背景原因,也有提高农民政治民主素质,整顿基层党组织作风的内部原因。由于这次选举是在“好人里挑好人”,出现了一些新的选举手段和做法,其成功的选举理念和实践在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史上谱写了最精彩的篇章。

从边区乡村自治建设的视角来看: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一些乡村自治建设的实践。如北洋政府开展的“地方自治”运动,国民政府也开展过“乡村运动”,并形成了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山东地区开展了多年的实践研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阶级关系的本质,这些乡村建设实践最终以夭折而告终。陕甘宁边区乡村自治建设由于党组织的有力领导和组织,达到了较高的程度,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改变党政关系混乱的局面,建立了党支部、基层政权及乡村民众组织相结合的立体结构模式,通过划分党支部、乡政府与民众组织的职权关系,各司其职,互相协调,统一灵活,保证了乡村自治有序开展。二是面对边区乡村党政干部存在的种种不良状况,边区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乡村干部,使乡村自治取得极大的成绩得到了组织保障。三是为了在实践中激发群众参与政治的广泛积极性,边区政府通过建立乡政府委员会、民众组织以及识字组、黑板报、冬学等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经过党的推动和群众的努力,达到了教化和改造群众自己的目的。

为了提高乡村自治的能力,边区通过开展模范乡村建设运动,使乡村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1946年4月,边区政府在总结模范乡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乡村自治”的重大任务,不仅反映了中共民主执政的理念,而且为今天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推广边区乡村自治中典型的实践经验,通过对绥德县吉镇区王家坪村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乡村自治的动力机制是构建乡村坚强领导核心、给人民带来利益以及民主的集体力量的发挥。乡村自治的运作机制是党政关系的顺畅、人民自治权利的落实、法律的保障以及村民公约的内在约束机制。乡村的自治主体状况是广大村民是乡村自治的主体,改造过的边缘群体是乡村自治的重要参与者。总结这些实践经验为当今基层自治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边区乡村民主运动视角来看:

边区乡村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环境是,封建势力在边区乡村占着主导地位,世俗传统迷信与封建神权迷信的交织影响,加上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落后,医疗条件缺乏等恶性循环的作用,使陕甘宁边区一带封建迷信甚为盛行。由此而产生的边缘群体数量众多,妇女社会地位低下。陕甘宁边区作为民主模范的“试验田”,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下路径选择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使边区成为“民主”的圣地。一是以反对封建剥削势力为核心内容的民主斗争。在中共乡村支部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结合减租减息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和乡村政权的改选运动,以社会公平的道德诉求为旗帜和地主展开了和平而激烈的民主斗争,为边区乡村民主政治的构建夯实了经济、政治、社会基础。二是以反对封建迷信为中心内